

结构主义语言学及其困境

索绪尔为语言符号所下的定义，尤其是他对语言符号结构关系的强调，极大地影响了此后几十年的西方语言学研究。从整体上看，注重分析和描述语言符号之结构是 20 世纪西方语言学研究的普遍倾向，形成所谓“结构主义”的思潮或流派。当然，作为一种特殊的研究方法，结构主义的操作范围远远超出了语言学领域，受它影响的还有文化人类学、生物学、心理学、哲学、文艺批评等其他人文和社会学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几乎所有领域里的结构主义思潮都源于索绪尔关于符号的理论，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只关注诸种社会文化现象之间的联系，而不重视这些现象本身的性质。因为本书的考察对象是语言符号，所以这里关于结构主义的论述就局限于语言学领域。

首先应该承认，结构主义语言学在语音层次的研究确实硕果累累，成绩斐然。我们在前一节里提到，索绪尔坚持语言形式的物理特征本身不具有语言学意义，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结构关系。这一观点后来被俄国语言学家特鲁别兹柯伊 (Nikolai Trubezkoy) 和雅柯布逊 (Roman Jakobson) 直接应用于语音研究，建立了与传统语音学相对立的“音位学”。在他们看来，虽然索绪尔关于语言是相对价值系统的观点具有划时代意义，但它并没有被充分贯彻到语言分析的每一个层次。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现代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发展，从声学或者发声的角度研究语音问题一直是语音学工作者的主要任务。但语音学家们往往只重视语言声音的物理学和生理学特征，而忽视这些声音在它们所处系统中的作用。为此，音位学家们提出了语音研究的功能方法，以强调分析语言声音相互之间的结构关系。

特鲁别兹柯伊率先作出“音素” (phone) 和“音位” (phoneme) 的区分。按照他的解释，音素是人体若干发音部位联合活动、由一次发音动作所构成并能够为听觉器官所直接感受的最小语音单位。如发汉语的 a [A] (啊) 时需要声带、软腭、舌头、嘴唇等器官以一定的状态作出相应的动作，因此音素具有若干方面的生理规定；音素还具有音的强弱、长短、高低和厚薄等方面的物理特征，所有这些特征的整体存在即构成语音单位。音位则指具体语言中语音的最小功能单位，它本身没有意义，而只区别词语、词组等语言单位的语音外壳，从而间接地辨别它们的意义。汉语普通话里“天” (tian) 和“颠” (dian) 之所以成为词语，是由于构成它们的语音单位 [t]，[d]，[i]，[a] 和 [n] 都是汉语普通话中的音位。从语音学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在实际的语流中识别几乎无限数目的音响种类，但音位学却把它们缩减至仅在语音系统中起到区别功用的那些成分，即所谓的“音位对立”。鉴别语音系统功能的依据是意义的变化与否，音位学家一般通过具体情境中的语音替换来进行测试 (commutation test)。例如，在英语中，/n/ 的发音会因人而异，但只要不跟其他语音成分混淆起来，它的各种变体仍然属于同一个音位；反之，如果把“night” 中的 /n/ 发成“light” 中的 /l/，就会引起词义变化。此外，不同的语言产生不同的音位系统，/n/ 和 /l/ 在英语里是两个不同的音位，但它们在汉语南京方言里却属于同一个音位，确切地说，它们是同一个音位的不同变体。

上述对语音系统的结构主义分析又被雅柯布逊向前推进了一步。他指出，音位虽然是语音组合中的最小单位，但它们还可以被继续划分为在发音部位上相互对立的区别性特征 (distinctive features in binary opposition)。这些特征的总数小于音位的数量，而且适合于对所有语言的描述，所以又被称为音位的普遍结构 (phonological universals)。请看下面的英语辅音和英语元音的区别性特征组成表 (图 5)：

英语辅音区分特征组成表
Distinctive feature composition of English consonants

		p	b	m	t	d	n	k	g	ŋ	f	v
音节	Syllabic	-	-	-	-	-	-	-	-	-	-	-
		(+)					(+)					
辅音	Consonant	+	+	+	+	+	+	+	+	+	+	+
响音	Sonorant	-	-	+	-	-	+	-	-	+	-	-
浊音	Voiced	-	+	+	-	+	+	-	+	+	-	+
延续音	Continuant	-	-	-	-	-	-	-	-	-	+	+
鼻音	Nasal	-	-	+	-	-	+	-	-	+	-	-
粗糙	Strident	-	-	-	-	-	-	-	-	-	+	+
边音	Lateral	-	-	-	-	-	-	-	-	-	-	-
散布音	Distributed	-	-	-	-	-	-	-	-	-	-	-
塞擦音	Affricate	-	-	-	-	-	-	-	-	-	-	-
唇音	Labial	+	+	+	-	-	-	-	-	-	+	+
舌前音	Coronal	-	-	-	+	+	+	-	-	-	-	-
前部音	Anterior	+	+	+	+	+	+	-	-	-	+	+
高位音	High	-	-	-	-	-	-	+	+	+	-	+
后位音	Back	-	-	-	-	-	-	+	+	+	-	-
低位音	Low	-	-	-	-	-	-	-	-	-	-	-

英语元音区分特征组成表
Distinctive feature composition of English vowels

		i(iy)	ɪ	e(eɪ)	ɛ	æ	u(uw)	ʊ	ʌ	o(ow)	ɔ	ɑ
音节	Syllabic	+	+	+	+	+	+	+	+	+	+	+
高位音	High	+	+	-	-	-	+	+	-	-	-	-
后位音	Back	-	-	-	-	-	+	+	+	+	+	+
低位音	Low	-	-	-	-	+	-	-	-	-	-	+
圆唇音	Round	-	-	-	-	-	+	+	-	+	+	-
长\紧音	Long(tense)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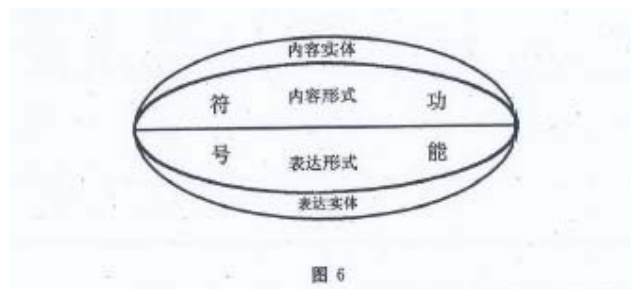
图 5

以上表格清楚地表明，音位的结构取决于它内部区分性特征的两元对立，如 /s/ 这个音位，我们可以用“+齿龈音、+延续音、+摩擦音、-元音、-浊音、-鼻音”来表示它的组成。当然，区别性特征不是语音的最小单位，因而没有独立的存在，它们必须多个地合在一起才能够构成高一层次的语音实体。

结构主义理论在语音研究方面的成功并不难理解。我们知道，语言结构的概念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符号本身的结构，另一个是符号元素的结构。语言的语音部分属于后者，它不牵涉到

语言的意义，因而相对简单。再说，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最多只有几十个音位，所以即使采用索绪尔提倡的否定区分的方法，也很容易将它们穷尽。一旦我们进入纷繁复杂的意义世界，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就显得不那么灵光了。

叶尔姆斯莱夫 (Louis Hjelmslev) 的理论可以说代表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巅峰。在本节的后半部分，我们将着重讨论他关于语言符号的阐述。虽然这位丹麦语言学家自称是索绪尔结构主义理论的忠实追随者，但他觉得索绪尔对语言符号系统的分析还不够彻底，必须从科学的角度加以改进和完善。他在评论索绪尔的语言定义时这样说：“经仔细分析，语言作为符号系统的定义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只关注语言的外部功能以及语言与其周围非语言因素之间的关系，而不关心语言本身及其内部功能。”叶尔姆斯莱夫：《语言理论导论》，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47 页。为了澄清“语言是符号系统”这一重要命题，叶尔姆斯莱夫建立起一套“语符学理论”(glossematics)。在索绪尔的经典理论中，语言符号的两个组成部分是“能指”和“所指”。叶尔姆斯莱夫将这一对概念分别改为“表达”(expression) 和“内容”(content)，并在这两个层面上作了“形式”(form) 与“实体”(substance) 的进一步区分，进而得出“表达形式”、“内容形式”、“表达实体”和“内容实体”这四项成分(图 6)：



然而，叶尔姆斯莱夫对索绪尔符号定义的改造远远超出简单的术语更换。按照一般人的理解，“符号”是独立意义的载体。这一结论在文本分析的初级阶段似乎毫无问题，通常被称为句子、短语的单词的语言实体都能够满足这一条件：它们都是独立意义的载体，因而都是符号。但叶尔姆斯莱夫认为语言分析不应该就此止步。他指出，语言必须在习得和运作上具有实用性。由于符号的系统是开放的，所以语言实用性的目标只能通过依靠有限数量的符号成分组成符号这一途径来实现。如果没有符号成分的存在，并通过它们的组合构成符号，语言的笨拙程度是不可想像的，这就是语言结构的本质特征。因此，“语言不能够被描述为纯粹的符号系统。从人们通常赋予它们的目的来看，语言首先是符号系统；但从它们的内部结构来看，语言是一种不同的东西，即能够被用来建构符号的元素 (figure) 的系统。”叶尔姆斯莱夫：《语言理论导论》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47 页。换句话说，符号并不是语言系统的终极成分，它还可以被继续划分为词根、词缀及其变格和变位形式。以英语单词 “in-act-iv-ate-s” 为例，如果把语言学的逐级分析贯彻到底，我们还可以得出五个具有意义的单位，但这些意义并不“独立”。同样，当表达层面的逐层分析进行到一定阶段时，它所产生的单位也不再是符号，而是符号的构成部分，如音节和音位。出于这一考虑，叶尔姆斯莱夫采用了“表达”和“内容”这对概念，以概括语言分析中可能出现的所有成分。他还把表达与内容的结合称为“符号功能”(sign function)。

“形式”与“实体”的区分由来已久，许多西方哲学家曾认真讨论过这对范畴。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本质由实体和形式共同组成，实体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材料，与其对立的则是形式或思维。换句话说，没有形式的实体是不可分辨的。在语言研究的历史上，形式与实体的对立却经常同表达与内容的对立混淆起来。有的语言学家把声音看做实体，而把它们在语言中的具体切割看做形式；也有语言学家把句法结构看做语言形式，与其对应的则是作为实体的意义；还有语言学家把语言的语音表达看做形式，而把意义或内容作为它的对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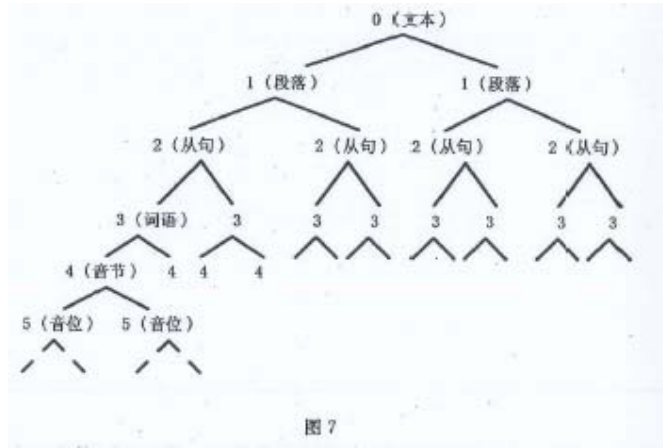
叶尔姆斯莱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可以说是别出心裁。他坚持认为，无论在内容还是表达层面上，我们都应该对语言作出，“实体”与“形式”的区分。就内容而言，内容素材 (content-purport) 原先是无形的思想团块，不同的语言赋予它不同的形式，结果“每一种语言都以其特殊的方式在无形的‘思想团块’上划出自己的疆界”，同上，第 52 页。如丹麦语和英语就以不相对应的词语来切割同一个颜色连续体。这种独立于内容素材、并使其获得形式的功能叫做“内容形式” (content-form)，而它所产生的结果则叫做“内容实体” (content-substance)。在表达层面上，表达素材 (expression-purport) 指的是人类发声的潜在可能，世界上各种自然语言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它，从而形成不同的音位系统。存在于所有语音系统背后的抽象结构就是表达形式 (expression-form)，而具体的语音系统则是与其对应的表达实体 (expression-substance)。

如此区分“实体”与“形式”显然非常繁琐，意大利符号学家艾科 (Umberto Eco) 称之为“拜占庭式的哲学”，但这一策略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来说却事关紧要。叶尔姆斯莱夫认为，语言学家应该认真关注语言之间的异同。语言之间的雷同即结构原则本身，它们之间的差异则是这一原则的具体表现。无论是雷同，还是差异，它们都不依赖于语言之外的某种因素，而是存在于语言之中，或者说存在于这些语言的内部结构之中。用索绪尔的话来说，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异同取决于它们的形式，而不是由这些形式所构成的实体。在语言产生之前，实体是没有形式的，因而也是不可知的。我们不应该把对实体的描述作为语言学研究的起点。相反，关于实体的描述有赖于对语言形式的描述，因为如果离开了形式，就无所谓实体的存在。叶尔姆斯莱夫最终得出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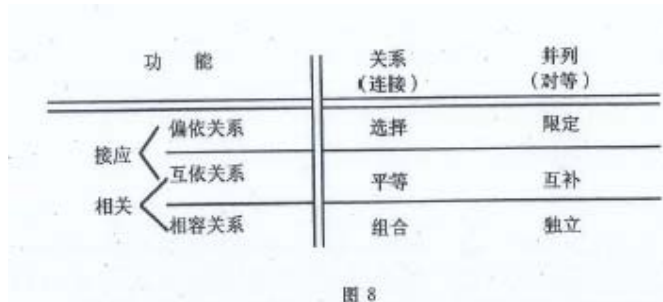
因此，在索绪尔关于形式与实体之区分的直接影响下，我们前面所作的思考使我们认识到：语言是形式，在那个具有功能的形式之外是非语言的材料，即索绪尔所说的“实体”或者叫素材 (purport)。语言学的任务是分析语言形式，而分析素材的使命则落到其他科学的头上。⁷

具体地讲，语符学的特点是以文本整体为操作起点，由上而下逐级分析语言的结构，并详细记录可能出现在语链(句子、从句、短语、词语等等)中同一位置的所有单位。这一步骤可用下图(图 7)来表示：

⁷ 叶尔姆斯莱夫：《语言理论导论》，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77 页。



由于实体(意义)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语言学研究之外，语符学对语言现象的分析只能以各个语言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依据。叶尔姆斯莱夫将语言中可能出现的结构关系列举如下(图8⁸)：



从表面上看，语符学的结构分析似乎加强了语言研究的严谨程度。也正因为这一点，语言学方法在本世纪中叶被其他许多人文学科借用，作为它们分析各自学科对象的典范。结构主义的追随者们在他们的研究中几乎千篇一律地首先孤立自己的考察对象，将该对象作为一个过程或者诸多成分的排列进行逐层分析，一直分析到最低的那个层次；然后利用两元对立的分类原则对每一层次的成分进行安排；通过替换测试排除所有的变体，为该考察对象设计一个模式；再通过分析同一层次和不同层次的成分之间的各种关系，建立该系统的组合规则；最后描述该系统在某一特定时间内出现的变化规律。

文学研究中采用结构主义方法的典型例子是俄国批评家普洛普(Vladimir Propp)。在普洛普看来，讨论文学作品“内容”的传统方法只能导致主观或混乱的结果。为此，他采纳了结构主义的方法，对大量的俄国民间故事进行分析。通过区分这些故事里的变动与不变动成分，他发现民间故事里的人物虽各不相同，但他们的功用却保持不变(普洛普将功用定义为“影响情节发展的人物行为”)。下面是他认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几条叙事原则：⁹

⁸ 叶尔姆斯莱夫：《语言理论导论》，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41页。

⁹ 普洛普：《民间故事结构》，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4页。

- 1) 人物的功用在故事中被作为稳定和不变的成分,由谁来完成这些功能,怎样完成这些功能,都无关紧要。它们构成一个故事的主要成分。
- 2) 民间故事中人物功用的数量是有限的。
- 3) 人物功用的顺序总是相同的。
- 4) 就结构而言,所有民间故事都属于同一类。

普洛普进而将不同故事中的人物功用进行了比较,发现它们的总数不超过 31。无论某个故事中出现几种功用,它们的顺序总是相同的。故事的开头不外乎引入某个家庭的若干成员,其中包括未来的主人公,然后必须在以下列举的各种功用中选择其一:

- 1) 家庭成员之一离家外出。
- 2) 主人公得知禁令。
- 3) 禁令遭到违背。
- 4) 反面人物作出侦探企图。
- 5) 反面人物得到有关施害对象的信息。
- 6) 反面人物欺骗受害者,以获取人或财。
- 7) 受害者上当,因而无意中帮助了敌人。
- 8a) 反面人物伤害家庭成员之一。
- 8b) 家庭某成员缺乏某物,或者希望得到某物。
- 9) 灾难或需求的消息传开:有人向主人公提出请求或命令;他获准离开,或被派遣前往。
- 10) 寻觅者同意或决定反击。
- 11) 主人公离家出发。
- 12) 主人公受到考验、诘问、攻击等等,为他得到魔力或人力帮助作铺垫。
- 13) 主人公对未来援助者的行动作出反应。
- 14) 主人公获得魔力。
- 15) 主人公被转到、送到或者领到所寻找对象的所在地。
- 16) 主人公与反面人物直接交战。
- 17) 主人公受挫。
- 18) 反面人物被打败。
- 19) 先前的不幸或匮乏被消除。
- 20) 主人公返回。
- 21) 主人公遭到追击。
- 22) 主人公得救。
- 23) 主人公此时已无人认识,来到家中或者另一个国家。
- 24) 一个假主人公前来提出无理要求。
- 25) 主人公被要求完成一项困难任务。
- 26) 难题得以解决。
- 27) 主人公得到认可。
- 28) 假主人公或反面人物被揭露。
- 29) 假主人公原形毕露。
- 30) 反面人物受到惩罚。
- 31) 主人公完婚,并登上王位。

以上 31 种人物功用又可以继续划分为更小的结构单位,如第一项功用(家庭成员之一离家外

出)就可能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

- 离家外出的家庭成员为长辈,如父母外出劳动;
- 较为戏剧化的“离开”是长辈的死亡;
- 有时离家出走的是晚辈,如: 外出玩耍; 外出钓鱼; 外出摘采果实, 等等。

叙事的结构关系远不止这些,人物功用的特定组合又构成较高层次上的单位,如(1-7)构成“铺垫”、(8-10)构成“深化”,其他的组合分别构成“冲突”、“高潮”和“结局”。当然并非所有的叙事单位都在同一个故事里出现,叙事者按照自己的逻辑任意组合这些元素。有些故事中“反面人物”和“假主人公”是两个不同的人物,在另外一些故事里,这两个角色可能由同一个人担当。对普洛普来说,文学研究的任务即分析每一个故事的独特结构。参见《民间故事结构》第96-99页的具体分析范例。批评家应该从隐藏在民间故事背后的深层结构出发,考察它们在不同故事中的具体组合。他对某个故事所叙述的具体内容并不感兴趣,而是关心抽象的叙事单位的结合方式。换句话说,文学批评家应该做的是建立某个叙事种类的语法、句法、或者章法。

其实,语符学以及整个结构主义分析程序的科学性外表具有很大的欺骗性。首先,语言学家或文学评论家完全依靠内部结构来判断一组符号是否属于某种语言的能力就很值得怀疑。假设一个人不懂英文,如果我们向他展示一组英文符号,他完全不可能从表达与内容之结合的意义上去认知符号。我们甚至有把握地说,这个人根本没有能力辨认该组符号到底是一个上下联贯的文本,还是一组文字的任意排列。既然如此,他就更不可能通过对符号表达层面的分析来获得各种符号元素的分布情况及其组合规律。这表明,形式分析本身不足于决定某一物质结构是否是语言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对表达形式的分析并不自动导致对内容形式的识别。

其次,结构主义语言学片面依赖语言的形式标志,因而往往不能区分语言中普遍存在的同形异义现象。参见陈明远:《语言学与现代科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117页。如英语口语中 [aneim] 这串音素既可以表示“a name”(一个名字),又可以表示“an aim”(一个目的),虽然它们的形式特征完全一样。如果采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我们就无法将它们区别开来。句法层次的分析也是如此,请看下面的例句:

- John is easy to please.
- John is eager to please.

从形式上讲,这两个句子完全一样,它们的句法结构都是“名词+系动词+形容词+动词不定式短语”,但就“John”是主动还是受动而言,这两个句子的差别却很大。前一个句子的大概意思是“人们容易使约翰高兴”;而后一个句子可大致译为“约翰急于使人高兴”。我们可以将第一个句子改写成“It is easy to please John”,其意义大体保持不变。但如果我们采用语符学的替换方法,将这个句子里的“easy”换成“eager”,结果就不能成立。为什么不能成立?这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所无法解答的。

不仅如此,即使在分析不具有多重意义的语言结构时,结构主义理论也离不开对语言意义存在的假定。以法语中的[r]为例,通过分析该音素与前后左右其他成分之间的关系,结构主义者往往可以得出以下四个他们认为是纯粹的形式特征:

- 1) [r] 属于辅音类;
- 2) [r] 属于可以在词尾或词头任意出现的准辅音类;
- 3) [r] 属于可跟在元音后面的次准辅音类;
- 4) [r] 可以跟属于同一范畴的某些成分相互替换(如[l])。

以上这些形式特征的纯粹程度很值得我们怀疑。前三种描述与[r]在语链中的一般功能有关,似乎只涉及它的组合规则,但实际上结构主义语言学还是没有能够避免类似“词头”、“词尾”这样的意义范畴,也就是说,它的具体分析还是建立在语言意义已经存在的前提之上。如果说前三项描述对意义存在的依赖还不明显,那么第四项描述明显已经将意义层面考虑在内。说[r]与[l]可以相互替换,就是因为它们的变动会使相应的意义改变或保持不变(如在汉语南京方言里)。所以说,完全从形式上分析语言是行不通的,即使“最严格”的形式分析也不得以意义的存在为其隐含的理论前提。